

总序

严家炎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①，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

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③，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④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劫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

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20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这就提醒我们：撰写这类专著时大可不必求全，不必担心遗漏某些与区域文化关系不密切的流派、社团和作家。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等。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七月派、九叶派，虽然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却是跨地区的社团或流派，并无明显的区域特征，可以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其中某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具有某种区域特征，则是另一回事）。作家也是如此。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而选取李劫人、沙汀则典型得多。总之，不在一个地区所有作家身上平均使用力气，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该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某些独有的特征。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

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除了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耻为人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之外，是不是和最近100多年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去外国的留学生也特别多有关系呢？在浙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确实最早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愿意买洋货，海员的家庭观念淡薄，市侩势利心日炽，等）；这些区域性的特点，是否和上述文学现象也密切关联呢？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从这个切入口进去，也许可以深挖出很多东西。

再如，鲁迅文字风格的锋利深刻，论辩时的善于击中要害，到底和浙江特产——“绍兴师爷笔法”有无关系？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鲁迅生前，早已有人提出过，甚至就此作过攻击，但鲁迅本人似乎并不回避。他在回答陈西滢所谓“刑名师爷”的指称时，态度相当鲜明：

……《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⑤

不仅不想洗刷自己，反倒像是对刑名笔法的赞许了。有意思的是，作为浙江同乡和过来人的蒋梦麟，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溯历史，肯定了师爷笔法和鲁迅文风的关系。他说：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

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土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⑥

到底“刑名师爷笔法”应该怎样评价？它对鲁迅或其他作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钱理群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曾作过很有见地的独到的研究。唐弢先生则不但在《鲁迅传》第一章中分析了“绍兴师爷”现象，还会当面告诉我以后打算亲自查阅刑名师爷们制作的若干案卷，以便同鲁迅文风作更多实证性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在研究区域文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时，应该知难而进地探讨这类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不能说很成熟。记得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曾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这个建议虽然得到理事会的赞同并通过，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但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

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

1994年4月11日初稿，6月30日修改补充

国家教委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93—1995)

目 录

一 东北地域文化概说 (12)

1. 黑土地上的远古人类活动 (13)
2. 中华文化文学的发源地之一 (14)
3. 生存环境与渔猎文化 (20)
4. 包融、混杂与多元文化态势 (25)

二 日神文化精神与东北作家的现实态度和文学态度 (31)

1. 源远流长的日神文化精神 (31)
2. 东北作家的歌哭呐喊·外倾心态与审美构造原则 (34)

三 漂泊与自由 (45)

1. 鸟图腾崇拜与漂泊心态和自由精神 (45)
2. 萧军萧红的人生轨迹和人格形态 (49)
3. 黑土地上的流浪者形象及其文学表现 (58)

四 土地、生命意象与雄犷苍凉的人生情态 (63)

1. 东北作家的土地情结 (63)
2. 端木蕻良笔下的土地与农民 (66)
3. 黑土地孕育的生命强力 (72)
4. 雄强犷悍的形象与性格 (79)
5. 情爱关系中的野性色彩 (84)
6. 对生命萎缩的痛心与批判 (90)

五 胡子与英雄——历史、文化和审美视角下的特殊人生评判 (96)

1. 历史与道德坼裂中的东北胡子现象 (96)
2. “隐恶扬善”的观照与描绘 (101)
3. 野性与人性的悲怆二重奏 (106)
4. 胡子精神的当代形态与流变 (113)

六 文化与民族多元融会撞击下的人生与文学 (118)

1. 萨满教的浸润 (118)
2. 俄苏文化的渗透与影响 (126)
3. 民族与文化多元撞击、融合中的人生景观 (133)

七 “老家在山东”——东北作家创作中的“文化恋母”和“寻根”现象 (140)

1. “文化恋母”的历史由来 (140)
2. 东北作家的“恋母”情结及其文学主题 (144)
3. 骆宾基笔下的乡土、乡亲和乡情 (149)

八 情义民风·乡土语言与文本特征 (159)

1. 多情重义的关东风情 (159)
2. 黑土地的语言构成 (164)
3. 地域·文化因素与文本特征 (169)

附录

东北区域文化与东北作家创作的二重结构和特征 (174)

《铁流》、《毁灭》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188)

流亡者的歌哭——论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创作 (199)

新时期东北作家群研究述评 (213)

主要参考书目 (231)

后记 (233)

Contents

- 1. A Survey of Northeast Region Culture (12)**
 - 1) Human Activities of the Ancient Time on the Black Land (13)
 - 2) On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Sources (14)
 - 3) Environment of Existence and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 (20)
 - 4) Trend of Cultural Diversity, Fusion and Mixture (25)
- 2. Apollo Spirit and the Northeastern Writers' Attitude toward Reality and Literature (31)**
 - 1) Long—Standing and Well—Established Apollo Spirit (31)
 - 2) Singing, Crying • Extraversion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the Northeastern Writers (34)
- 3. Wandering and Freedom (45)**
 - 1) Birds Totem Worship, Psychology of Wandering and Spirit of Freedom (45)
 - 2) Character Structures and Life Tracks of Xiao Jun and Xiao Hong (49)
 - 3) The Image of Wanderers and Its Literary Expression on the Black Land (58)
- 4. Land, Life Images and Rough, Desolate Human Sentiment (63)**

- 1) The Land Complex of the Northeastern Writers (63)
- 2) The Land and Peasants in Duan Mu Hong Liang' s Works (66)
- 3) The Strength of Life Bred by the Black Land (72)
- 4) Vigorous and Rough Images and Characters (79)
- 5) The Wildness in the Love Relation (84)
- 6) Lament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Withering Life (90)

5. Bandits and Heroes—An Evaluation of the Special Life from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96)

- 1) The Northeastern Bandit Images in History and Morality Breaking (96)
- 2) Refle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Hiding the Evil and Preaching the Good (101)
- 3) The Tragic Duet of Humanity and Inhumanity (106)
- 4) The Contemporary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Bandit Spirit (113)

6. The Life and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Diversifying and Merging Culture and Nationalities (118)

- 1) Permeation of Shaman Religion (118)
- 2) The Permeation and Influence of Russian and Soviet Union Culture (126)
- 3) A Life Observation in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of Diversifying Culture and Nationalities (133)

7. “The Hometown is in Shangdong Province” — “Cultural Oedipus Complex” and “Root seeking”

Among the Northeastern Writers (140)

- 1) The Origin of Cultural Oedipus Complex (140)
- 2) Oedipus Complex and the Theme in Literature (144)
- 3) The Native Soil, Native Folks and Native Emotion in Luo Binji' s Works (149)

8. Faithfulness, Folk Customs, Native Language and

Literary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159)

- 1) The Northeastern Customs of Rich Emotions and Personal Loyalty (159)
- 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guage on the Black Land (164)
- 3) The Region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and Textual Features (169)

Appendix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ual Creative Structure of Writers in the Northeast. ” (174)

“Iron Flow, Destru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Writers in the Northeast” (188)

“Exiles’ Cry—On the Creation of Writers in the Northeast in the 1930’ s” (199)

“Critical Review of Modern Northeastern Writers” (213)

Main Reference Books (231)

Postscript (233)

一 东北地域文化概说

雄踞于东方亚洲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整个版图犹如一只翘首报晓的金鸡。这只金鸡的鸡头部分，就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处东北亚，在亚洲及全世界占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它历史悠久，早在约公元前23世纪的尧舜时代，天下分为九州，“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⑦。它地域辽阔，几乎囊括了东北亚大部分地区，是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在清咸丰八年（1858）以前，它包括辽河、黑龙江、绥芬河、图们江等领域，远至库页岛，土地面积达百余万平方公里，至今仍有数10万平方公里。它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饶，境内有高山平原、有大海大川，有中国最大的森林资源，有石油煤炭、各种矿产，有牛马成群、人参鹿茸、大豆高粱，更有那一把攥得出油的黑色的神奇的土地。它民族众多，从古至今有100多个民族在白山黑水间生息绵延，如东北夷、肃慎、古朝鲜、东胡、扶余、高句丽、乌桓、鲜卑、邑娄、匈奴、勿吉、宝韦、契丹、靺鞨、渤海、女真、蒙古、满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吉里迷、苦夷等，约40个东北土著民族一直延续至今。它文化灿烂，那些崛起于白山黑水、草原大野的一个个扬鞭牧马的民族，各以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智慧才能，创造了与这片神奇的土地相应称的独特的文化。

不过，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北地区的文化长期以来始终未能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并得到人们的公认和共识。一提起东北，山海关内的很多国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东北不是大碗酒大碗肉，就是蛮荒一片，根本无文化可言。东北的一些作家文人，由于未能仔细认真地了解东北历史文化，也总是人云亦云地认

为东北的文化土层太薄，想“寻根”都无处可寻。这种情况的形成，自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相对中原而言，东北地处边塞，历史上又一直是多民族生活繁衍之地，各民族不断地进行攻伐、兼并与融合，又加上缺乏统一的语言，因而，未能像关内的秦晋、燕赵、齐鲁、吴越、湘楚文化那样形成独立自足的且为天下公认共识的区域文化体系。这样，就容易在一些未能饱读史书的人们心目中形成东北无文化的模糊认识。其次，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将中原看成中华文化的摇篮，将东北看成中华文化的辐射区，因而认为东北不可能有什么区域文化，即或有，也不过是中华中原文化辐射后没有多大变相的余脉余波。第三，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在考察和看待某种文化时，只从纯粹的精神文化、上层文化、主流文化着眼，而未能从大文化观念、从自然状况、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亚文化等多种角度和“文化共相”来全面掌握，因而也很容易很自然地得出东北无文化的片面认识。的确，若只从纯粹的精神文化和上层文化看去，东北未出现过孔孟老庄屈骚汉赋的是“文化盲区”。然而，若从大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看去，东北文化亦是星河灿烂、五彩缤纷。近年来辽宁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不仅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不仅将中华文明史的时间大大前推，而且有力地说明东北是中华文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因此，近年来中国、日本、朝鲜、南韩、苏联（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专家，一致地将这一地区的文化称之为“东北亚文化”并对之进行着全面的研究，东北亚文化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现在，让我们面对丰富的材料，透过历史的遂道，对东北文化作一番匆匆的巡礼。

1. 黑土地上的远古人类活动

关于东北亚人类的起源问题，目前各国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不过，根据地下出土文物及古人类人骨化石的对比研究证明，东北亚的人类最早来源于北京猿人。那是距今15万年左右，一支北京猿人向东北移动。他们来到了今辽宁喀左地区，在这山

水相依、野兽出没的山林中定居与生活，他们使用打制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原始简陋的工具，成为开发东北地区的第一批原始居民。其后，中原人类从南北两条通道——今西辽河与北方草原，继续向东北迁徙。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原来客，约在距今一万至四万年间来到白山黑水。到了晚更新世时代，人类广泛地采用投石索、飞去来器和投矛，发明了威力强大的弓箭。这些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信心大大增强。当寒冷的冰期气候又一次袭击北半球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动植物日益减少，中原地区的人类为了生存向东北挺进，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迁徙。他们跨过了黑龙江，走到了西伯利亚的尽头，踏上今白令海峡的坚冰，进入了尚无人迹的美洲大陆，成为发现和开拓美洲新大陆的最早的人类。已经有大量的史迹史料表明，是中国人最早踏上美洲大陆，“古印地安人部落的祖先由亚洲中部出发，越过白令海峡，入居于原先荒无人迹的新大陆”^⑧。印地安的祖先来源于中国，印地安人的文化与中华文化有不解之缘。远古的东北成为旧大陆人类向新大陆迁徙的桥梁，成为亚、美两洲进行文化联系的纽带。^⑨

这批中原来客在东北地区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中有些进入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约在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地球气温上升，白令海峡又被海水淹没，中断了亚洲与美洲两个大陆上的交通。此后，来自中原的人群就定居在白山黑水的广阔土地上。据考古资料和古人类化石表明，距今四五万年到一万年左右，这些来自中原的人类广泛地活动在东北大地上，演化为辽宁建平人、吉林安图人、榆树人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东北大地上留下了他们生活与创造的文化遗迹。

2. 中华文化文学的发源地之一

东北不仅是中国大地上较早有人类居住、并成为人类史前大迁徙的纽带与桥梁的地区，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换言之，东北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东北地域文化在其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当中国大地上华夏族的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之际，夏商周三代，在我国东部地区居住着许多称夷的氏族、部族和民族，泛称九夷。晋人郭璞的《尔雅注》称：“九夷在东”。古史《竹书纪年》中的九夷名称分别是：吠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据《论语》疏的考证，九夷又称元菟、乐浪、高丽、满饰、凫臾、索家、东屠、倭人、天鄙。后人写《九夷考》，说东夷九种，分黄、白、玄、赤、蓝、阳、于、方、吠，分布在从黑龙江流域、鸭绿江流域到日本西海岸的东北亚地区。但在我国古代，夷人的分布不仅仅在东北地区，还包括山东、江苏、河北等中国东部地区，史称东夷。对此，曾是新月社著名诗人、后成为著名甲骨文专家的陈梦家于三、四十年代在《禹贡》杂志上发表的《佳夷考》一文中指出：“余意夷族本在东北，东夷、南夷、淮夷皆其南迁后之别名，故玄鸟降生之故事，行于东北民族，亦行于淮夷，商于夷为一系，故其传说亦同。”也就是说，夷人最早分布发源于东北，后来南迁至中国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个说法已得到史迹的证实。如山东《齐鲁》为东夷故地，东夷文化和其后崛起于东北的乌桓、契丹、鲜卑等同属一个文化脉系。到汉代时，东北夷人有了专称，被称为东北夷，东汉学者郑玄、高诱，晋代孔晁，唐代颜师古等人都使用了这个名词。

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七八千年前在西安半坡和浙江河姆渡出现了灿烂的细石器文化时，东北夷人亦在从辽西丘陵到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地区内，创造了同类的文化。考古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和黑龙江兴凯湖附近的新开流文化遗址表明，东北夷人同西安半坡、浙江河姆渡、西北仰韶时代的人类一样，不仅创造了渔猎时代的物质文化（鱼叉、鱼钩等生产工具），而且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精神文化——那些具有远古图腾性质的、刻在石头、兽骨、陶器上的鸟兽虫鱼和人神图象。在辽宁红山牛河梁女神庙和后洼等文化遗址中亦都存在着属于图腾文化的人头像和女神像。1977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还发现了距今5000年记载“玄鸟生商”神话的陶文。这些都是远古人类的图画文字，标志着人类文化文明创造与进化的阶梯。

讲到玄鸟生商的神话，它不仅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种古籍中均有记载，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重大史实：上古时代的商民族是东北亚土生土长的原始民族。据《太平御览》卷271云：“简翟浴玄丘之水，燕遗卵，吞之，剖背生契”。《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注：“天使燕下而生商者，谓燕遗卵，娥氏之女简翟吞之而生契。”契封于商，成为商民族的始祖。《荀子》成相篇中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近于商。”《淮南子》地形训说：“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玄丘之水和砥石山，都在今天东北西界。著名学者于省吾、胡厚宣先生从古器物徽识和刻石上以铁的证据证明了玄鸟生商的可靠性和古老性。^⑩近年还有不少学者从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学等多种角度证明了作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一的商民族，其族源来自于居住在东北的东北夷。八十年代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丰富文化遗迹，更充分地说明：“商先文化的源头，应是广被于幽燕之地的红山文化。只有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才能看到商先传说的踪影和殷商文化的本源。”^⑪来自于东北夷的商民族进入中原后创造的灿烂的殷商文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和组成部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此不赘述。正因为商民族来源于东北亚，故来源于西部的周民族灭掉商朝后，封商王族箕子于东北亚的古朝鲜为王。箕子带去大批商朝的官员百姓，融合于古朝鲜族中。不仅如此，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很多民族集团，据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都与东夷、东北夷有血缘关系。比如，“秦王族先民最强大的一支来自东夷，……他们与土著结合后……大量接受西北羌戎集团的血液和文化^⑫”。楚国沅水流域的五陵蛮是盘瓠的后裔，盘瓠出自东夷族^⑬。而东夷和东北夷，如前所述，在族源和文化上均同源同脉。近年一些学者对从古至今东北一些民族同东夷文化相同性的研究，更加说明这一点^⑭。

神话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除玄鸟生商的神话而外，中国的很多上古神话都与东北亚文化和东夷文化有关。

《周易·系辞》讲述中国文化历史起自伏羲，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

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羲即伏羲，伏羲即太皞，相传“太皞帝包羲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羲，长于成纪，蛇身人首……或谓之伏羲，或谓之虑羲，一号皇雄氏”¹⁵。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俩，结为夫妻，繁衍后代。现在一般认为，伏羲（太皞）为九夷中的风夷始祖，即东夷族早期首领。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可能与当时原始氏族的族内婚相关。女娲既与伏羲同一部族，则其当然也是东夷、东北夷的祖先。女娲炼石补天、抁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风俗通义》引俗说，谓“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抁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纆于沚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纆人也”。辽宁牛河梁发现的距今五千年前的女神像，即系黄土塑造，与女娲造人的神话密切相关。故有人认为“牛河梁女神像是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可以说，泥塑的‘黄土之神’，就是民族之神”¹⁵。不仅如此，考古学和神话学的研究表明，有关太阳神帝颛顼及善射英雄后羿和嫦娥奔月的神话，都与以太阳和鸟为图腾的东北夷及其文化相关，东北亚是它们共同的源头¹⁶。

除神话之外，礼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辽西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群的发现，使学者们认为中华文明、包括上古礼制也始源于此。前引《周易·系辞》已说明中国礼制文化始于伏羲，而伏羲是东北夷的首领和始祖。正因为礼制起源于东北亚夷族，所以当后来中原地区社会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旧的礼制被新的礼制代替的时候，东北亚土著民族和社会却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即始于伏羲时代的渔猎文明一直长期承传不变而未能像中原那样从渔猎文明进入农业文明并创造出灿烂精致的农业文化硕果，因此，发源于伏羲时代东北夷族的礼制文化才能在周边后进民族社会中保存下来，“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¹⁷。

东北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亦十分密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